

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白永瑞（韓國延世大學）

1. 三個帝國與東亞秩序

超越紛爭和分裂的歷史，建立和平、共存共榮的東亞，不僅在韓國社會，在東亞各地都在熱烈的討論，並有人試圖付諸實踐。處在 21 世紀之初，如果我們要想能真正擔負起這一重任，則需具有能突破現實束縛的創造性思維。回顧東亞秩序歷史的動機也正在於此，我們覺得追溯歷史也許有助於培養我們的創造性思維。

所謂東亞秩序，指的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東亞國際問題所適用的，或維持國際關係的某種特定範式。這裏之所以要用“一定時期”來對其時間範圍加以限定，是因為東亞秩序自古就是不斷變化的，而且相信將來還會發生變動。實際上，如果回顧一下影響東亞國際關係的特定範式的演變軌跡，就會發現東亞國際關係是伴隨著中國、日本、美國等中心國家的交替變化而不斷被重新規定的。所以，本文擬通過考察中華帝國、日本帝國及美帝國所主導的東亞秩序的形成、膨脹與消亡的過程來分析各時期東亞秩序的歷史特點。

當然，對這三個秩序都通稱為“帝國”，也許會引起爭議。¹所以，為了盡可能避免可能產生的誤會，這裏有必要首先簡單說明一下本文所說的帝國的意義。帝國概念的核心也許就是帝國在本國和周邊國家——在東亞則先後有朝貢國、殖民地、衛星國的性質變化——之間的關係上設定一定的位階秩序，享有獨自規定帝國勢力圈之內各國對內對外政策的權力。從這種意義來看，完全可以用帝國的視角來比較近代以前和以後的東亞秩序的運作方式。這樣也許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特徵，而且能夠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間的連續性。

當然，從帝國的視角來看東亞秩序，也會過分抬高中心國家的規定性，而相對忽視了在東亞秩序中處於周邊地位的國家的作用，以及東亞秩序的變化過程，所以這裏也儘量考慮到了周邊的視角。²尤其是以周邊國之一，韓國的地位和作用為焦點，回顧東亞秩序的歷史，展望 21 世紀新東亞秩序產生的可能性。

2. 中華帝國與小中心

傳統時代東亞國家間關係的特定範式大體上可以稱之為中國主導的華夷秩序。可是如果將這規定為中華帝國的秩序，也許會有人提出異議。所謂中華帝國並非單純指的是皇帝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體制（即帝政），而指的是規範構成一個帝國圈的帝國本國和周邊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的位階秩序。如果這麼說的話，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否真的是這樣，也許還有不同意見。

中國的華夷秩序一般理解為以中國皇帝與周邊各國的國王之間所形成的禮儀關係為基礎的

¹ “(皇)帝”和“國(家)”概念雖然早已存在，但是將二者合在一起形成“帝國”概念卻直到清末尚未在中國文獻中出現，只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結束，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以後，日本人將“empire”翻譯為帝國，並傳播到東亞其他國家(吉村忠典, <帝國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 《史學雜誌》, 第 108 篇 3 号, 1999, 3)。至於帝國的意義，不僅政治學的理解與經濟學的理解有所不同，最近甚至還出現了脫領土的網路上的全球“帝國”這種後現代的帝國概念，所以人們一直在多種意義上使用帝國這一概念。本文並沒有對帝國概念加以深入分析，只是作為考察東亞秩序的歷史延續性和斷裂性的工具，在有限的意義上來使用這一概念的。

² 至於周邊的視角的多層次意義，參見崔元植、白永瑞編《從周邊看東亞》(首爾: 文學與知性社, 2004) 所載筆者的序言。

國際秩序。它起源于秦漢統一王朝出現以後，中國王朝與周邊各國家和民族所建立的政治關係，到後來具有世界帝國特徵的隋唐出現以後，其特徵更加明確。在隋唐世界帝國解體以後，到 15 世紀初明朝建立以後隨著朝貢制度的形成而國際秩序也進一步體系化。

這種華夷秩序的第一個特徵就是中國人的世界觀華夷思想成爲這一秩序最爲核心的理論基礎。從將中國視爲世界中心的自民族中心主義出發，將中國作爲文明的中心“華”，而把周邊視爲落後的“夷”，即以文明的程度來確定彼此的地位差別，從而形成位階秩序的文明圈。可是，由於周邊國家和民族也可以接受這一文明的標準，因而具有文化普遍主義的外形。當然，歷史上中華帝國也根據自身所處的現實狀況和需要，有時也有選擇地使用武力強迫周邊屈服，可是明清時期所表現的典型的朝貢關係說明中國並沒有直接統治周邊的意圖，而是採取冊封周邊國家的君主，在內政和外交上發揮影響力的間接統治方式，特別是滿洲族所建立的清朝，在廣大的版圖內統治著多個民族，表現出多元的景象。與這種間接統治方式相輔相成的是周邊國家也共有中國的天下觀乃至華夷觀，具有一種文明共同體的性質。正是因爲有了這種特點，所以中華帝國秩序往往並不是中國單方面強迫建立的支配從屬的位階關係，與近代世界出現的帝國主義的支配關係相比能夠建立範圍更加廣大，更加多元的、寬容的秩序，所以從今天的立場看來，這也許可以成爲我們探索帝國秩序的替代方案的一種思想資源。³

可是，筆者還是想提醒大家應該注意中華帝國的“帝國性”，因爲中國歷代王朝爲了提高自身的正統性，都追求一種帝國傾向，這也是理解中華帝國的關鍵。雖然所有王朝都追求能夠統一天下，將帝國的權力統一於中央的大一統，但是真正能夠統治周邊的四夷或將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以實現大一統的中華王朝才能算是中華帝國（例如秦、漢、唐、元、明、清）。因此，中華帝國當然指的是中華王朝，但是中華王朝並不一定都能被稱爲中華帝國。這種大一統觀念也同樣影響到征服王朝的統治理念。⁴可是在西爲沙漠，東爲大海的有限的地理範圍內，一旦將統治範圍之內的民族和地域統一於帝國，輒不會輕易承認它們從帝國分裂出去，將國家組織視爲正統，這種集團記憶被深深烙印在中國人的腦海裏。

那麼，中華帝國的周邊爲什麼參與這一秩序呢？鄭容和的論文⁵通過朝鮮的例子，深入分析了周邊自發地參與中華帝國秩序的動機。與日本同中國有大海阻隔不同，朝鮮是中國的鄰國，只能通過朝貢來保障國家安全和內政外交的自主空間。此外，從儒教文明圈的中心中國的天子那裏獲得冊封，以提高自己統治權的正當性。特別是在發生像壬辰倭亂這樣的外來侵略或內部民眾叛亂，政權處於危機之中時，更是要依靠朝貢體制來獲得國際的政權保障。

華夷秩序的另一特徵就是在中國皇帝和周邊國王之間的朝貢和回賜的關係之上派生出國際貿易關係。從朝貢的次數、規模來看，這種貿易除了只能在規定的範圍之內進行的國家間的公貿易之外，還有被編入使節團的特權商人與對方特權商人之間進行的私貿易。由此看來華夷秩序既

³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國大陸出版了一些著眼於這種特徵的研究成果，如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和趙汀陽的《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在汪暉看來，朝貢體制是以王道這一倫理觀念爲基礎的，其中可以找到足以對抗近代民族國家惡性膨脹而產生的帝國主義理論，體現亞洲的近代的內在連續性的理論資源。趙汀陽則將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與現代國際政治相嫁接，提出要廢除“帝國秩序”，而代之以“天下秩序”（沒有異端或他者的世界秩序）。在中國之外也有類似的主張，在構型 21 世紀東亞地域秩序的規範時，重視華夷秩序的理念和原理（以大同主義爲基礎的調和與共存理念，儒教原理的道德主義、相互主義、均分主義等），並注意到因這些理念和原理與現實、實踐發生詭離而導致被歪曲或形骸化的歷史事實（金鳳珍，〈東アジア規範秩序の構築に向けて：朝鮮半島からの視點〉，大沼保昭 編著《東亞の構想》，筑摩書房 2000）。在中國語圈知識份子中對這一見解持反對態度的人也不少。不管怎樣，對於天下觀（甚至朝貢體制）能否作爲去中國的普遍資源的爭論，在現在必然會與 21 世紀中國的作用規定這一現實問題密切相關。

⁴ 這一想法受到了王柯（〈帝國と民族：中國における支配正當性の視線〉，山本有造 編，《帝國の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部 2003）的啓示。關於中華帝國空間和正統論的複雜關係，可參見李成珪《中華帝國的膨脹和縮小：其理念和實際》（《歷史學報》186 輯，2005）。

⁵ 本文原本是筆者爲《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共同體》（首爾：創批社，2005）一書所寫的導論。本修正稿中，偶爾會出現人名或論文名稱卻不註明出處，都是這本書收錄的文章。

是國家、王朝之間的禮儀的對外關係，而是外交和通商上相輔相成的國際秩序。

從周邊國家的角度來看，中華帝國的這種特徵也許表現得更加明顯。姜玠亞注意到傳統時代中國經濟超越於西方之上的生產能力和技術力量，所以認為周邊國家參與中華帝國秩序並不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中國”，而是因為有一個“富有的中國”。最近學術界開始以東亞為中心重新解釋世界史。根據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中國依靠在絲綢、茶、陶瓷器等主要世界貿易商品上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技術水準和生產能力，在 16 世紀以來的三百餘年裏一直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維持著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與歐洲拉開距離是從白銀開始流出的 1820 年以後的事情）。正是在這一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正式的朝貢貿易體制衰落，而私貿易興盛，引起了國際貿易的一大變化。因此，在早期朝鮮被密切編入朝貢體制，與其他地區相比在安定地供給物品和輸入技術方面具有更有利的條件，因此雖然在“緊跟中國型發展”上能暫時領先，但是到後來反而是像日本那樣的偏邦國家更加有利。

那麼說來中華帝國為什麼會崩潰呢？對於這一問題也同樣可以從周邊的視角來分析其原因。為此我們首先需要理解這樣一種事實，即在中國中心的東亞秩序之中，還存在著多個由小中心秩序形成的重層世界。中華世界之中的小中心也同樣借助中國的華夷觀，並將其適用於自己的周邊地區。⁶例如在韓半島，高句麗早就以“華”自處，將周邊民族納為屬民，朝鮮王朝世宗和世祖在對女真的政策上也同樣接受女真的朝貢，也滿足日本稱朝鮮為“大國”或“上國”。朝鮮後期，當滿洲族建立的清朝統治中國大陸以後，朝鮮更以“小中華”自居，這些歷史事實都可以放在這一脈絡上來理解。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日本和越南與各自周邊地區所結成的關係上。如果把這些歷史現象看作對“中華思想的分享”，那麼這一地域也許就可以被稱作“中華思想共用圈”。⁷如果把這些小中心的作用放在巨大的朝貢貿易體制框架內來觀察，特別是越南、朝鮮、日本這樣的周邊國家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規模朝貢體制”，希望以此改變中國中心的秩序，這種努力也許可以被視為這一地域歷史變動主要動力。⁸

在筆者看來，中華世界的重層性也許正是中華帝國變化的內在要因。在 19 世紀後半以前，尤其是在滿洲族的清取朝代漢族的明朝以後，即 16 世紀末期以來中國中心的秩序已經受到來自周邊國家的批判，小中心自身的認同性（identity）也逐漸體系化，對後來這些國家向作為國民國家形成原動力的民族認同性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這種思想變換無論如何還只是作為促進中華世界變化的內因在起作用，而改變這一架構自身的力量卻來自外部，即來自起源於西方的世界資本主義的衝擊。

中華秩序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轉變為一個一個的國民國家，這一過程與西方歷史上中世帝國分裂為眾多小的國家，最後發展為國民國家的過程很不相同。⁹中國作為一個傳統帝國，其內部各民族沒有獨立城為國民國家，中國幾乎原封不動地沿襲了清朝以來的領土，而發展為一個龐大的國民國家，只是其位於其周邊的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擺脫朝貢體制，成為獨立的國民國家，將“披著國民國家外衣的帝國”中國視為他者，以確立自己的主體性。

3· 日本帝國失敗的大東亞共榮圈

在中華帝國動搖的同時，東亞在西方列強所標榜的萬國公法的基礎上重建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轉為根據新的主權概念，由享有主權的國家之間相互訂立契約，即條約而成立的國際關係。在

⁶ 閔門基《東亞的實體及展望》，《與時間的競爭》，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2001。

⁷ 古田博司，〈東アジア中華思想共有圈の形成〉，駒井洋 編，《脱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しての社會知》，ミネルヴァ書房 1998。

⁸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 1997。

⁹ 楊念群《什麼是“東亞”？：近代以後韓中日的“亞洲”想像的差異及其結果》，《大東文化研究》，首爾：50 輯，2005。

向這種新秩序轉變過程中，各國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近代世界，以主權概念為基礎的萬國公法所闡述的國際關係原則，在現實中很少被遵守，而肆行於世的則是資本主義的動力及作為其強制手段的武力。甚至可以說，主權的原則與現實的隔閡不是例外的情況，恰是其正常狀態。從根本上說來，近代國際秩序是在標榜萬國公法和文明的國際秩序的時，卻由霸權國家主導這一秩序的方向，這是其內在的矛盾。

可是在東亞，不存在霸權國家，不安定的秩序還在繼續。從這種意義來說，這時期的東亞的狀況也可以說是“無中心的東亞”。至於其緣由，金基正從世界體制論的角度進行了說明。19世紀後半期世界體制經歷了一次結構性變動，英國失去了霸權國家的地位，而與此同時以德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上升為世界的中心國家，世界體制正在從“單一中心結構”向“多元中心結構”轉變。在這一變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列強之間的激烈競爭，從而加強對新近編入的周邊國家的壓迫，尤其是在東亞，在德國、美國和俄國等發展稍晚的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同時，日本又加入進來，所以只會形成極度不安定的中心——周邊結構。

在中華秩序下處於偏邦地位的日本，這時為能取代沒落的中華帝國，從而具有“華”的地位（所謂的華夷變態），積極輸入西方文明，成功地進行了體制改革。因此逐步修訂了過去在歐美列強壓迫下開港通商時不得不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體制（1899年廢除治外法權，1911年恢復關稅自主權等），由此從周邊上升到半周邊，再急速進入到中心的行列，鞏固了日本帝國勢力範圍的基礎。日本充分利用了這時期不安定的國際秩序，列強走向勢力同盟的趨勢下成功地與英國結成同盟體制，在阻止俄國南下的同時，上升為這一地域的“中心”。日本的這種對外戰略也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這是因為美國想通過與日本的聯合來維持其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先後吞併了臺灣（1895）和朝鮮（1910），進而在1931年侵佔中國東北地區，扶持傀儡政權“滿洲國”，從而得以大大擴大了日本帝國的版圖。可是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日本與英美的矛盾也產生了。隨著日本勢力進一步向中國內陸擴張，終於在1937年挑起全面侵華戰爭，日本與英美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更加激化。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所選擇的道路是結束不安定的“無中心的東亞”，由日本來主導東亞地域秩序。所以，日本表面上以推翻英美的殖民統治，解放東亞各民族為藉口，企圖取代傳統的中華秩序，建立大日本帝國的自給自足體系（即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帝國在與美國的關係日益惡化的情況下，為了利用德國在歐洲接連得手的大好時機而撈取利益，同時也為了防止德國勢力可能介入東南亞地區，從1940年8月起連續幾個月裏竭力推進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但是其思想基礎乃是日本在脫離中華秩序過程中形成的亞細亞主義。日本在追求近代化的初期就提出了與西方相區別的，強調內在獨特性的“東洋”概念，將中國視為東洋的一個國民國家而使之相對化，從而規定了日本的主體性。這一思想傾向就是日本所謂亞細亞主義。作為這一思想譜系的一部分，特別是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為了儘快結束中日戰爭的持久戰狀態，“和平”地重構東亞秩序，提出了東亞新秩序論。東亞新秩序論包括了幾方面的思想，任城模分析了其中最為激進的尾岐秀實的東亞協同體論，指出了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聯合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革日本，進而以日本為首的東亞民眾為主體，對東亞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尾岐秀實的這種理論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東亞協同體論的思想“臨界點”。雖然他的構想在現實中遭遇了失敗，還是在右派掌握的亞細亞主義和左派所掌握的國際主義之間打入一個楔子，他這種將地域構想與日本國內改革論相結合的獨特思想，在我們理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時也是不容忽視的。

與這種東亞協同體論主張以日本和中國為軸心，主張控制民族主義和日本的社會結構改革相比，大東亞共榮圈可以說是以超民族主義(ultra-nationalism)為號召，追求日本在東亞的霸權。當然對這兩者之間的延續和斷絕也還有討論的必要，雖然如此，金晸一還是強調了兩者的區別。從表面上看來大東亞共榮圈所追求的是與西方這一他者相對的亞洲的認同性，希望實現亞洲各民族和國家的相互聯合，但從根本上說已經背離了亞細亞主義，主要是從軍事理論導出的一種構想，不過是企圖將家族倫理和天皇制理論擴張到整個亞洲而已。無論是他們作為克服西方價值的普遍

理論“近代超克”論還是世界史理論，都只不過是根據日本的需要而強加給所有亞洲人的。這樣，日本帝國與中華帝國不同，不具備在理念上提供文明標準等價值的地位，所以只能動員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統治來維持其帝國的存在。

此外，這種理念在經濟領域也缺乏其基礎。日本帝國不能像中華帝國那樣依靠自身豐富的經濟力來吸引周邊國家，而是為了解決處於帝國勢力圈中心而資源貧乏的日本本國攫取資源，掠奪周邊國家，換句話說這種秩序構造中所標榜的“共榮”只能靠軍事力量來實現，也必然隨著日本的戰敗而退出歷史舞臺。因此，對於日本帝國的這種為自給自足而豎立起來的大東亞共榮圈，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考察其分業構造的實際運作方式及其影響，可惜未能充分加以分析。大東亞共榮圈果真是作為日本的資本、技術與其他鄰國的農業經濟相互調和的東亞國家間的分業體系在發揮作用，還是具有由中心（日本）、半中心（朝鮮等）和周邊（偽滿洲國等）構成的三元構造的獨特的地域體系，這些還是將來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深入闡述的問題。¹⁰

正是因為這些特徵，我們對日本帝國是否真的在東亞具有帝國所應有的獨佔性權力也心存疑問。只是在 20 世紀 40 年代前半期極為短暫的時期，在與歐美的矛盾對立中，在這一地區強制實行排他性的權力，很快又遭受失敗的帝國，或是只能看作一個“准帝國”。¹¹

4· 冷戰時期美帝國的亞太秩序

日本帝國沒落以後，東亞各國徹底完成了去殖民地化過程，即積極追求政治上的獨立和經濟上的自立。但是推動這一任務的國民國家卻在美國和蘇聯主導的世界冷戰秩序的磁場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東亞秩序也基本上從屬於在東亞地域形成的所謂自由陣營與共產陣營的對立，尤其是兩大霸權國家之一的美國，正因蘇聯主導的共產陣營存在為理由，介入個別國家的同時，將國家間的關係納入自由陣營的聯合之中，從而維持了較為安定的結構。從這種意義來說，美國和蘇聯都是領導著一定數量的衛星國家的帝國，而且這種帝國“立足於意識形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技術轉移，互惠，以及軍事合作，擴大發展為範圍更加廣泛的同盟”¹²。美國為了維持帝國內的團結，不僅強迫東亞各國採用美國的社會體制，甚至對韓半島和越南直接進行軍事介入。

美國的這種帝國秩序能夠維持的前提條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具有壓倒優勢的軍事力量。此外，美國最為強大的經濟力量（生產的高效率和龐大的市場，世界通用貨幣美元）和同盟國的政治支持，以及為維持霸權而樹立的意識形態也都是重要因素。

首先從政治、軍事領域來看，美國與日本不同，它不直接統治殖民地，取而代之的是採取通過與各個國家單獨締結同盟而對東亞進行間接控制（雖然在必要地方設置軍事基地，駐紮美軍）的地域統合方式，推行將日本作為下位夥伴的戰略。換句話說，美國是一種非正式的帝國。根據

¹⁰ 介紹、批評主張三元構造的 Bruce Comings 的見解的論文參見韓錫政《試論大東亞共榮圈和世界體制論的適用性》（《韓國社會學》第 33 輯，1999 年冬季號）。日本考慮到中國而提出的國際間分業體系不僅在歷史上，在今天有什麼意義，歷史學家中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黃東淵《中國現代史理解的問題點及其克服的展望》（《中國現代史研究》首爾；第 10 輯，2000.12）和文明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關於汪精衛政權與亞細亞主義的對話》（《中國現代史研究》第 11 輯，2001.6）。

¹¹ 對於大東亞共榮圈，也有從日本帝國周邊的角度重新審視的必要。遭受日本本國掠奪的朝鮮、琉球、台灣和中國大陸淪陷區等地的民族主義抵抗及相互聯合運動，以及周邊國家對東亞合作體制的反應，特別是將這作為追求戰時變革的絕好時機，試圖在提高朝鮮在帝國圈的位階秩序中的地位的同時，保全朝鮮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特性的朝鮮“轉向”社會主義者的反應等帝國圈內的改革運動包括在內的複雜情況進一步加以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日本帝國主導的東亞秩序的实际情況（洪宗郁《1930 年代における植民地朝鮮人の思想的模索：金明植の現實認識と轉向を中心に》，《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42 号，2004.12；方基中編《日帝下知識分子的法西斯體制認識及對應》，首爾；慧眼，2005）。此外，在日本帝國之外中國也挑戰日本論述亞洲的獨佔權，構想了多種多樣的亞洲觀——在批判日本侵略性的亞細亞主義的同時，也同樣具有追求亞細亞的聯合的共同傾向，只是在是以中國為中心，還是在此之外實行民眾的聯合上有所不同而已——對理解 20 世紀前半期東亞秩序也是不可忽視的知性遺產。可是中國的蔣介石政府更重視的不是東亞，而是與美國、英國或蘇聯之間的國際合作。

¹² Charlmers A. Johnson, *Blowback*, 韓譯本，首爾：三仁，2003，pp.56-57.

金明燮的研究，美國最初也打算向在歐洲所實行的那樣，在東亞促進地域統合，但是圍繞著是支持歐洲恢復其在東亞的殖民統治，還是推行以日本為中心促進東亞地域統合的戰略，產生了不同意見，結果美國還是選擇了扶植日本的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雖然也對泛亞洲主義的復活存有戒心，但在陷入東亞熱戰漩渦的情況下，通過 1951 年三藩市和約和美日安保條約的締結，對美國來說出現了一個消除了毒素的“大東亞”。換句話說，經濟上以日本為中心建立垂直地域分業體制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聯繫網部分復活了。這是一種“沒有公開發表的地域統合”。日本統治者在適應這一秩序的同時，也認識到這是將復活自己已經破碎的帝國夢想的絕好時機，所以也積極利用它來追求自國的利益。

可是，對於美國的這種地域統合戰略，東亞各國也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接受的。最早韓國的李承晚、菲律賓的季里諾(Quirino)和逃到臺灣的蔣介石試圖建立具有反共同盟性質的太平洋同盟，雖然最後因美國的反對而流產，其在軍事方面的宗旨還是為以後歐洲和東南亞國家參與的東南亞條約機構(SEATO)所繼承。而且，在韓國戰爭的衝擊下，1955 年在印度的主導下召開了萬隆會議，不結盟勢力(“非同盟勢力”)也開始關注自生的地域秩序的形成。參加這一會議的亞洲國家開始摸索第三條道路，即既不是社會主義的方式，也不是美國式的新型的發展路線。

但是一部分國家這種探索過程由於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推行新的政策而失敗，美國成功地建立了支持自由的勢力均衡。於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東亞安保秩序，以及與之相應的經濟秩序得以維持，其原動力來自美國所具有的經濟吸引力，特別是美國市場向亞細亞同盟國開放，從而構築了亞太經濟聯繫網，東亞國家也因此經濟上、軍事安全上依附於美國。這時出現了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域概念。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到 20 世紀 60 年代已經具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力量，成功地加入了“富人俱樂部”，並在東亞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視窗就是亞洲開發銀行，樸泰均對此有詳細的闡述。結果，這種在美國和日本的主導之下，韓國和東南亞國家受排斥的垂直結構被固定下來。

亞洲各國之所以被吸進這一新秩序，美國所傳播的理念乃至價值觀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的甘迺迪政府批評了過去只重視軍事援助政策的不足，接受了作為亞洲國家以民族主義發為展動力的近代化型式，實行積極援助個別國家的政策，以加強自由陣營內部在反共問題上的團結。結果亞洲國家紛紛將開發主義作為國家建設的最大任務。美國的大眾文化也得以廣泛傳播，並成為東亞人稍微主動地接受美國文明作為標準的重要武器。

上面主要通過中心國家的作用和動向來考察了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為了說明這一秩序的變動趨勢，還有必要從周邊的觀點來作進一步的分析。雖然對這一問題沒能真正解決，以周邊國家之一的韓國的選擇為焦點而進行的整理分析，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直到冷戰尚在持續的 20 世紀 80 年代，韓國仍在冷戰秩序的磁場之中，在分裂體制的半邊為建立國民國家而努力，但是也利用這史無前例的機會為以後在東亞地域秩序中發揮積極作用奠定了基礎，從這種角度來說分析韓國就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這時期的韓國，與其說單純是冷戰秩序的受害者，還不如說是這一秩序的受益者或利用者。¹³大體說來，韓國的歷屆政權都在依賴美國這一帝國的同時，也將冷戰論理和狀況作為在分裂體制下建設國民國家的機會積極加以利用，在這點上具有連續性。只是在對日本和北韓的存在的對應方式上有所不同，如果說這是冷戰型國民國家，擺脫這種狀況的努力大概從盧泰愚政權的北方外交開始，接著有金泳三政權的“世界化”政策，最後通過金大中政權的“陽光政策”，取得了

¹³ 這一視角來自李鍾元《東北亞國際秩序中的韓國座標及展望》(韓國政治外交學會編《列強的佔領政策與分斷國家的獨立、統一》，首爾：建國大學校出版社，1999)。根據此文的論述，李承晚政權雖然很好地利用了冷戰秩序激化的時代背景，將美國深深地拖入韓半島，但是也不願接受美國扶植日本為地域中心，而使韓國陷入從屬的地位的地域秩序構想，其代價是南北對立激化，導致了韓國在東亞秩序中被孤立的結果。朴正熙政權積極利用了美國重視日本的戰略，改善同日本的關係，實現韓日關係正常化，強行出兵越南，以爭取軍需物資加工訂貨，提高韓國的國際政治地位。雖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經濟增長，但是這種開發主義的弊端也影響深遠，利用北韓的威脅來加強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在國際上的孤立也更加嚴重。

一定的成果。與此同時，韓國知識界也從 20 世紀 90 年代，在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內部民主化的基礎上，積極適應脫冷戰的時代狀況，開始討論東亞地域主義。

5· 脫中心的東亞秩序的探索

幾乎在韓國人開始將包括韓半島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域置於自己的視野之內來思考問題的同時，在東亞地域也自發地出現了地域統合的動向。這種新動向不是要恢復過去東亞歷史中存在過的中華帝國或日本帝國秩序那樣的，周邊國家從屬於中心國家形態的統合，而是從周邊向中心擴散的地域統合，從這點來說它是一種全新的實踐。實際上在冷戰秩序下，美國只能接受美國與亞洲各國之間的縱向關係（兩者主義，bilateralism），所以亞洲內部的橫向聯合（多者主義，multilateralism）很難產生，同時亞洲各國也以各自的民族主義為動力，追求發展主義，也很少會關注地域統合的問題。可是與冷戰初期不同，到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以前規制東亞秩序的美國的內部動力和外部環境開始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在美國霸權安定時期建立起來的構造開始出現危機。¹⁴

這種危機首先是美國霸權主義自身所含的內在矛盾，即支撐霸權的權力資源出現了極度的不均等現象。儘管在軍事力量上美國依然佔據壓倒優勢地位，但是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則不是這樣，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美國只是吸取世界經濟的商品和資本，而不能相應地提供財富，逐漸演變成世界經濟的黑洞。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其經濟現在只不過是借助於世界中心貨幣美元才勉強支撐。但是軍事上的霸權主義必然會帶來龐大的軍費支出，因此必然擴大美國的財政赤字。而為了縮小財政赤字，擺脫日益依賴於海外金融支援的狀況，美國所要推行的還是軍事霸權主義，這樣危機只能更加深化，陷入惡性循環。此外，在意識形態領域過去在與蘇聯主導的共產圈相對立過程中得以維持的自由陣營的聯合，現在也失去了號召力，面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氾濫，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的努力日益活躍。這樣，在美國失去了過去所具有的內部動力同時，相反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急速崛起，中國在這一地域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對美國來說這也是不得不面臨的新的外部環境。

美國掌握霸權的東亞秩序的分裂也為這一地域建立脫中心的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這一變化過程中，依靠東南亞國家聯盟，東亞地域內部超越國境的合作、相互依存與正式的制度化統合相重合的聯繫網路正在增加，其主體既有政府、企業，也包括民間聯合運動，多種多樣。尤其如 1996 年東亞經濟危機之後 ASEAN+3 形態所顯示的，制度化的努力進一步加強，甚至在 2005 年末舉行東亞首腦會談。與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域概念競爭過程中，“東亞”一詞呈現出新的意義。

可是東亞的地域統合努力一方面以經濟領域為先導，另一方面有分散的市民聯合運動日益發展，具有很強的自下而上的統合的特徵，所以這種非正式的聯繫網路構想也常常被稱為“軟性地域主義”（soft-regionalism）¹⁵。相反，依靠正式的（主要是政府間的）協定自上而下的制度創設過程卻進展緩慢。

對此，至少在安全、軍事方面依然具有壓倒優勢的美國也開始擔心自己是否會在東亞受到排斥，因此東亞秩序的未來必然在美國單極的主導權與東亞多極的地域統合努力之間妥協、競爭的過程中展開。雖然會不安定，但是的脫中心、多中心的步伐已經邁出。

那麼在脫中心的東亞創立新秩序過程中，韓國將發揮怎樣的作用呢？針對這一問題，李南周的文章專門作了回答。他指出將來出現的新的秩序現在還難以確定，是以國民國家為基礎而建立

¹⁴ 下面關於美國霸權的論述主要依據柳在建《美國霸權的危機與世界史的轉換》，《創作與批評》2005 年春季號。

¹⁵ T.J. 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編者的序言；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ishi,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緒論。

的舊的秩序繼續維持下去，還是要克服國民國家的局限，這兩種發展方向會繼續相互作用，未來的新秩序也許要在這樣複合的過程中形成。具體說來，也就是要在批判的考察現在進行之中的地域合作體促進狀況的基礎上探索替代方案。在政治、安全方面，為取代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的替代方案，支持多國間的安全合作，為促進安全合作，不僅要重視國家自身的安全，也要保障、增進和調和個人的人權，也就是要更加關注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問題。在經濟領域，在肯定加速發展的地域統合趨勢的同時，考慮到地域內各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強調為增進共同利益而必須調整各國的發展模式。他期待著這些意見能夠實現，其根據就是東亞的地域統合不再是由美國那樣追求霸權的國家所主導的。可是在創造新秩序的過程中，希望韓國這樣中等規模的國家能夠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尤其是韓國已經具備了比較發達的民主主義和市民社會等基本條件，應當更加積極地介入東亞合作，對於地域合作要有新的姿態。

白池雲強調了民間團體作為創造新的地域秩序的主體的作用。他從反思歷史上出現的東亞秩序都是帝國運營的，而今天的東亞地域共同體概念中依然受到國家間聯合體觀念的影響出發，希望，目前正在進行的超越國境的基層民間團體的聯合能夠為新的地域共同體典型健康的基礎。他具體分析了各種類型的聯合運動的實際活動個案，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有價值的知識，還在承認各國民間運動的差異的同時，提出了聯合的方向。尤其對東亞各國民間運動主體所面臨的矛盾，即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之間連動的問題，他提醒大家就像這一問題的危言會涉及各國民眾一樣，其解決的方法也不僅僅在於一國內部的對政府抗爭，如果不發展為超越國境的聯合運動而難以取得成效。

最後，還需要分析一下在東亞人建設脫中心的新東亞的過程中過去的帝國是否會復活的問題。對未來的構想並不亞于歷史推演的意義，也同樣有助於培養我們的想像力。

在東亞歷史上存在的三個帝國中，美國分明在未來短時期內還會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布希政權的極右派看來，將帝國的作用這一用語作為用來表現某種使命感的辭彙接受下來，也許會利用軍事手段重新編織“帝國”的新版圖。可是正如前面所闡述的，獨佔的權利結構已經開始分裂，多中心開始形成，一國突出型多中心結構（用中國式的表述來說就是“一超多強”）在東亞持續的可能性比較大。相反，日本帝國復活的可能性現在看來並不大，日本在過去統治帝國的時期，其本國在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吸引力也一直很弱；現在日本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先進的技術水準和軍事力量，但是過度依賴美國，缺乏獨自的對外政策決定能力，似乎很難獲得美國的下位夥伴以上的地位。所以，令人擔心的不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再次出現，而是美日寡頭統治的高度現實性（當然最近日本的右傾化傾向也引起了亞洲鄰國的憂慮，也出現了要警惕新版大東亞共榮圈出現的呼聲，但我寧可相信，這可能是為了引起大家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警惕而利用了人們的歷史記憶而已）。

與此相比，最近大家所關注的具有更大的復活可能性的還是中國。回顧歷史，在 19 世紀末隨著中華帝國的沒落，東亞秩序也陷入了多中心相互競爭的不安定局面。在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中國重新崛起，東亞地域秩序也再次進入激變期，中國在東亞的地政學地位是如此重要。

乍看之下，中華帝國與霸權全盛期的美國相似，處在具有壓倒優勢的超強大國家地位，將國際關係問題，都是以勢力均衡思考來處理，依據文明的理論來形成一種位階秩序，這種文明在誘導著周邊參與秩序的國家的自發性。而更為重要的是無與倫比的強大經濟實力給周邊國家帶來的實惠對這一地域秩序的維持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將來中華帝國要想復活，首先必須使自己的經濟實力能發揮像過去那樣的吸引力。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經濟總量的急劇增加，是讓人聯想到中華帝國復活的關鍵因素。可是，如果不從國家經濟總量，而是從人均國民收入來看，或者從國內的階層、地域和民族間的貧富分化來看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則有樂觀和悲觀兩種觀點的爭論，至少還看不到中國有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霸權國家的可能性，但是不難想像中國還是會建立起在東亞作為地域強國而發揮自身作用的經濟基礎。

而且從政治、軍事安全來說，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擁有核武器國家，在為解決朝鮮核問題而舉行的六方會談中所發揮的作用也反映了中國作為地域強國的地位，但是很明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在政治、軍事力量方面還是趕不上美國。最後，中國能否像過去那樣提出文明的標準，並為周邊國家所接受，對中國的這種能力（即軟權力，soft-power）還不容樂觀。中國不是立足於民主主義，而是通過復興大一統的歷史記憶來追求權力的合法性，走的是以民族主義為動力的現代化模式，並未創造出能克服其弊端的獨特的發展模式，即使中國要主導東亞秩序，也不容易讓周邊國家自發地參與其中。

總之，雖說中國至少可以成為地域強國，新版中華帝國的復活尚不可能。而且，與中國在過去王權間的國際秩序中掌握霸權，維持華夷秩序的時期不同，現在不僅有美國、日本這樣的中心並存，還有民間社會也作為重要的行為主體參與進來，在這種地域狀況下如何能夠建立新版中華帝國？儘管如此，帝國復活論或中國威脅論依然出現的原因是什麼呢？正如前面所闡述的，這不僅出於對中國在政治、經濟領域所具有的實力的警戒心理，也來源於因對中國共產黨一黨統治的政治體制的不信任而產生的價值觀、理念的差異，更為根本的原因是無論是從實體上還是從形象上中國在規模上的絕對優勢不能不讓周邊國家意識到它的存在。關於這點，對於中國是否真的是對周圍國家構成威脅的強國的問題，筆者主張應該將對中國實體的考察，與對歷史和文化記憶中的大國象形的探討區分開來。¹⁶我們常常表現出將兩者混為一談的種種傾向。兩者雖然基本上是分開的，但是在特定的歷史狀況下又會重疊，對此將作進一步的說明。現在中國如果真的成為威脅性存在，則必須具備三大要素。首先中國必須有威脅鄰國的意圖（intention）和能力（capability）。與這兩種要素相連的，感覺到中國威脅的一方的感覺或認識（perception）也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對此，不僅鄰國的有形力量（國力）會起作用，其國家內部一般人對中國的認識也發揮一定的影響。所以，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記憶，即對帝國的記憶在現實生活中成為導出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因素，這種情況也可能發生。在這時，相互區別的兩個層次會聯繫起來。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中華帝國身上，在周邊國家感受到日本帝國的威脅時歷史記憶也在起作用。因此，中國和日本如果想讓周圍國家對自己的未來發展戰略不致於感到威脅，必須用大力氣調整甚至改革自國的發展戰略，使之能真正有利於東亞的共存共榮，而且還要肅清本國人腦海中殘存的“草根帝國意識”¹⁷。如果不這樣，則必然會為爭奪東亞的主導權而相互競爭和制約，對相對方的帝國的集團記憶也就會在現實中被喚起，我們也就不能克服帝國的憂傷歷史。走向脫中心化的現在也是有史以來在這一地域建立多中心共存的地域秩序的最好時期。現在，在帝國的記憶上相對較為自由，在歷史上也曾發揮過“小中心”作用，對其可能性與局限性一一經驗過的韓國，也許可以在各個中心之間起到調節者，及和平和繁榮的促進者的作用，與此相應地進行一些內部改革，那麼我們韓國在 21 世紀的東亞歷史中自然也會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¹⁶ 參見筆者為韓國讀者所寫的《為構築東亞和平而讀史：幾點建議》（《黃海文化》2004 年冬季號）和為中國讀者所作的發言（白永瑞、陳光興、孫歌座談《關於東亞論述的可能性》，《書城》2004 年 12 月號）。

¹⁷ 對談 姜尙中・高橋哲哉，「草の根の帝國意識」，『週刊讀書人』，2005 年 8 月 19 日。

